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辽宁日报

2021年6月20日
星期日

堡壘
BAOLEI



921-2021

学术支持

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
辽宁省档案馆
中共瓦房店市委党史研究室
瓦房店市档案馆

责任编辑

周仲全
视觉设计
隋文锋
检校
孙 广 史凤斌

04

瓦房店党支部走出多位优秀共产党员

一九二四年就有党的基层组织

本报记者 郭 平

提要

李笛晨、孙祥麟……
从瓦房店走出，将星星之火撒在东北大地，如反抗，走上了反帝爱国斗争道路。此后，多位党的火种引燃。在党的领导下，当地人民勇于瓦房店地区开展活动，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将革命的火种引燃。在党的领导下，当地人民勇于瓦房店地区开展活动，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将革命的火种引燃。在党的领导下，当地人民勇于瓦房店地区开展活动，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将革命的火种引燃。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日俄战争后，日本侵略者在瓦房店不断进行殖民扩张，1906年成立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以瓦房店火车站为中心，用界石划定了南北长约三里、东西宽约一里的“铁路附属地”，又称“租借地”，这里的一切事务，中国人无权过问，当地百姓称附属地为新市街。1913年7月25日，复县警察三处一名巡官和两名巡兵路过此地时，遭到日本警察的逮捕和扣押。老百姓更不敢去新市街，怕遭到日本警察和日本殖民者的打骂。

据《瓦房店市志》记载：1919年时，瓦房店

由于留存至今的文字材料寥寥无几，这使得研究瓦房店地区早期党组织活动的情况十分困难，为此，瓦房店几代党史工作者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到20世纪90年代终于得出结论。

中共瓦房店市委党史研究室老一辈党史工作者、研究员赫安龄告诉记者：“党的早期革命者罗四维在1924年就来到了瓦房店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建立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

罗四维早期在瓦房店地区活动的记述，散见于当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录中。经过到罗四维的家乡湖北黄冈调查后，党史研究者终于还原了瓦房店地区早期党的基层组织的革命史。

罗四维，原名罗会章，又名罗常云，化名罗思维、思危、驶危、邱春生，1898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区罗家嘴子。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参加了二七大罢工。罢工失败后，共产党员或调出湖北，或转到农村。

罗四维是陈日新的同学，陈的哥哥陈亚新任奉天省复县知事（县长），比较开明。1923年下半年，罗四维离开湖北来东北传播革命火种。

1924年上半年，罗四维来到复县公署工作，公开身份是第二科科员。他特别注意培养进步人士，先后结识了县教育公所文牍（秘书）孙祥麟和第二科科长李笛晨。

孙祥麟字敏生，又名孙佐民，从事教育工作。罗四维见他思想进步，就主动接近他、帮助他，送给他许多进步书籍看，孙祥麟开始接受马列主义。

李笛晨1899年生，1918年考入奉天师范学校读书，在学习期间参加了传播新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的“星期三会”，毕业后进一步接受和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24年，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复县公署第二科科长谢瑛，谢瑛将他安排在二科里当科员。

经过观察和培养，1924年，罗四维先后介绍孙祥麟、李笛晨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他们利用孙祥麟任教育公所文牍的合法身份，办起了平民夜校，谢瑛、罗四维“暗中尽力负指挥之责”，李笛晨常被孙祥麟请到平民夜校中去讲课，借这个阵地向学员宣传革命道理以启发群众觉悟。他们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在罗四维写给团中央的信中和孙祥麟的回忆录中都有记述。

赫安龄说：“瓦房店地区1924年就有了党的基层组织，这个结论经过了瓦房店市党史界多次研讨，得到了中央档案馆和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省委党校相关专家一致认同。”

由于没有确切文字记载，研究者认为当时瓦房店地区至少已经存在了党小组，负责人便是罗四维。

赫安龄说：“尽管他们当时的政治身份是隐蔽的，活动也很秘密，但时隔不久，他们的活动还是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勒令夜校停办。”

为了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他们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

迫于复县的紧张形势，1925年初，瓦房店地区最早的3名党员之一李笛晨先行离开，前往奉天兵工厂，在那里发展党员，成立党小组，李笛晨任小组负责人，组织起了2万多名工人参加的罢工斗争。此后，他又辗转大连、吉林、北平等地，不断宣传革命，发动群众，1933年不幸在练习泅渡时溺水牺牲，年仅34岁。1949年，李笛晨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李笛晨离开瓦房店地区时，罗四维也准备离开，他们商议，让孙祥麟重回第九小学任教



瓦房店火车站旧照。



瓦房店特支活动的主要地点县立第九小学。

农民自发反抗殖民统治

的中国居民仅有87户，465人，而日本进入瓦房店的人口却有2270人。

不仅如此，日本殖民者很快发现了当地煤矿、铜矿和盐业资源，开始疯狂掠夺，日本殖民当局的压迫和反动军阀的黑暗统治激起了瓦房店人民的反抗。

1919年5月9日，正值“二十一条”国耻纪念日，瓦房店地区县立第九小学青年教师孙祥麟积极行动，在学生和平民中高唱、教唱《国耻纪念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揭露日本占领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罪行。

罗四维是瓦房店地区的播火者

校务报告(庶务部)

1926年3、4月份

自从“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各方对于我校压迫日益加厉。在那惨案发生的两星期中，几乎完全是筹备传染，关于卫生是极力讲究，总算还好。直到国民党遵守南口、北方的季候完全转变了，并且雷厉风行的要搜查赤化党人，并有宣传品，更是犯危险性。假有人要是将他放在家里，学校的检查实现了，并且还要检查住家的，因此我校一切文件诚恐稍有失落，不得不送到保险箱暂存。我们做试卷，各地方寄来参考书，都是锁着的，这可是我们在近数日以来做试卷的最大原因。现在气候是有些好了，不过所有的文件仍旧没有拿出来，如果要拿出来，那是随时有上霉可能性。

还有，几个月之中，起初是京汉不通，山西及保定一带的信不得来，我们也没法去信，后来京奉也不通，而今京绥还是不通，因此各地方的学生和我们的关系都断绝过一些时，除北京而外，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两个月以内，派出的人特别多，或是巡视，或是特派短时间驻于某处，直到今天，还(有)三个人在外面呢！这是我们救济上面所说弱点的一个方法(面)。

在这几个月中，因天气不正的原因，各地方自然受到影响，我们预定在本月底以前能够筹备到五千元的事，也不能实现了。大同、丰镇、丰台的分校都关了门，石家庄的分校也关门，关了一些时候，最近有人去，总算恢复起一班来。这是就减的方面说。在增的方面说起来，大连和乐亭已正式成立地方分校。新成立的支校，也有七处。如长辛店、瓦房店、文、路、定(这三个是在山西)、磁县、周上(保定附近)等处，至于陕北的一个分校，四个支校，那是新划归我们的。

总共统计说来，现在有一个十一个地方分校。二十七个特别支校。学生一千一百六十九人。

组织方面在学校无大变动……

柏桂

瓦房店党史工作者抄录的1926年的《校务报告(庶务部)》。在当时，校务是党委工作的代号，支校是特别支部的代号，柏桂是中共北方区委的代号。括号内的文字为党史研究者所加。



复县公署通缉高士勤呈报文。

李笛晨、孙祥麟等人从这里走出

长。在孙祥麟写给团中央的信中，讲述了当时这样做的原因：“瓦房店是复县后开的商场，老顽固们尚未立下根基，比较容易做事，该处又是南满十大站之一，在日本工厂做工的有四百多人，他们都深受帝国主义经济的压迫，亦容易联络起来，而且有联络的必要。”

1925年春，罗四维被调往河南任开封市焦作煤矿党支部书记，参与领导焦作煤矿工人罢工。此后，他先后到河南、湖北、江西等地开展革命工作，并曾任红六军政治委员。后在汉阳被敌人杀害，年仅30岁。

孙祥麟任第九小学校长时，与思想进步的第九小学正教员(教导主任)高士勤联系较多，孙祥麟积极组织工会，宣传革命道理。高士勤在第九小学和瓦房店铁路工人中宣传进步思想，逐步接

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孙祥麟和高士勤一道，利用学校这块阵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不久，“五卅”惨案发生，他们首先在师生中宣传、演说，宣讲“五卅”惨案的情况，激起了师生的爱国热情。1925年6月，他们组织县立第九小学的罢课游行斗争，同时组织了市民上街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罢工，并在师生、工人和市民中发起了救济上海遇难同胞的募捐活动，共捐款300余元，直接寄往上海。

在他们的指导下，复县中师200余名学生经过短暂的组织准备，连夜编写口号、印刷传单，开始了罢课游行斗争，活动持续了20多天。

此后，孙祥麟、高士勤还组织了南满铁路瓦房店站百余名工人的罢工斗争，时间达四天，成为南满工运史上最早的一次罢工斗争。

这次罢工也引起了日本殖民者的警觉，他们事后开除了工人，解散了工会组织，还强迫复县公署下令逮捕孙祥麟。

在朋友的帮助下，孙祥麟于1926年春去吉林省柳河县任视学，继续开展革命宣传、发展党员，建立了柳河县第一个党小组。后来又辗转黑龙江、吉林等地开展革命工作。

留在瓦房店继续斗争的高士勤注重发展革命力量，扩大组织队伍，先后发展了林贵武(又名林芳芳)、胡新鹏(又名胡翼举)、祝海忠、王涵世、王保仁、杨汝明、何锡恩、姜长安等十余人入党，建立了中共瓦房店特别支部，高士勤任书记。

的辽宁早期党组织的档案。

他们确实看到了一页黄色毛边纸，而且是红色的栏框，这页纸的末尾还有模糊的“孙祥麟”三个字。遗憾的是，整页纸的其他部分基本看不到文字的痕迹了。

赫安龄说：“那个时候技术手段落后，没有手机可以拍照，查档案全是靠手工抄写，而且复制档案的管理很严格，所以没有留下图片资料。”

不过，在这次查询档案过程中，还是有了喜人的收获，他们找到了一份《校务报告(庶

务部)》，是当时中共北方区委用代码写给中央的工作汇报。这份档案落款为柏桂，是中共北方区委的代号，档案的时间为1926年三四月份，其中明确记有：“新成立的支校，也有七处。如长辛店、瓦房店、文、路、定、磁县、周上等处……”这里的支校是特别支部的代称。

这份报告为瓦房店地区在1926年三四月间便有了中共瓦房店特别支部提供了确定的证明。

(中共瓦房店市委党史研究室、瓦房店市档案馆供图)

追寻一页黄色毛边纸

本报记者 郭 平

始有意识地收集相关材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份史料中，他看到这样的记载：“辽宁省地方党史编委会办公室王殿举同志介绍，中共满洲省委在1927年—1928年向党中央汇报中提到，1925年前至1926年，复县东山小学里有一个支部，校长任支部书记，并且活动得很坚决。”

于是，他们开始找寻王殿举，最终在滨州市找到了他，了解到一些情况。

接下来，他们便开始查询档案。在中央档案馆，他们几乎翻阅了全部保存下来

“瓦房店地区早期党的基层组织情况作为一项研究课题提出来，始自一次访谈。”党史工作者赫安龄说。

访问对象是时任中共瓦房店市委老干部局副局长的李万海。上世纪50年代，李万海曾在共青团辽宁省委组织部工作，他回忆说：“1955年，在一次省委机关内部展览中，见到一份黄色毛边纸，用毛笔写的《复县党支部活动计划》。”那时他正准备调往复县工作，所以对复县的这份材料印象很深。

这条线索引起了赫安龄的重视，他开